

【台湾故事·名人寻踪之一】人文幸得绵延

□许志杰

——钱穆寓所素书楼

游山读书,用功尽在一心。这是钱穆先生对自己的评价,十分得当,素书楼下,发思人之情愫:一代国学大师,非钱穆莫属,有他,人文幸得绵延。



1990年,台湾国民、民进两党斗争波及国学大师钱穆,时任立法委员的民进党人士陈水扁书面质询钱穆位于东吴大学校园内寓所素书楼非法使用国家土地,强烈要求限期迁出。已经96岁高龄的钱穆和夫人,不愿背负“侵占市产”的指控,毅然于当年的6月搬出已经居住了23年的素书楼,到位于台北杭州南路的寓所居住。经不起晚年迁居的折腾和打击,两个月后的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辞世。先生生前所作对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让人唏嘘不已,更佩服钱穆大师宽阔的胸襟和光明磊落的处世行为。

经过了一场政治风波的素书楼,于今正式被保护辟为钱穆故居,其格局形制完全依照钱穆先生居住时的样子予以保留,免费对外开放。虽然我于2014年春天再到台湾,一个重要访点就是寻访寓居台湾的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行踪,但是,走进素书楼却是在不经意间的一个喜出望外的喜悦。3月18日,在拜访了位于台北南岗的“中央研究院”之后,我乘公交车返回驻地。车行阳明山下,绿树成荫,溪水流长,透过车窗,一块巨大的竖牌坊映入眼帘,上面写着:东吴大学。忽然记起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故居就在校内,急忙下车,打问的第一位路人就给我们指出了钱穆故居“素书楼”所在位置。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路小跑便来到了于僻静处安穩幽幽的素书楼前。

钱穆先生1895年7月30日出生在江南名镇无锡一个清苦守矩的名门读书人家,所谓读书并非上多少年私塾,读了什

么样的大学,而是好学。钱穆17岁辍学到一所小学任教,并开始自学国史,1930年他35岁的时候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篇文章使他在国学界崭露头角并立足其中,成为大师。先是被燕京大学聘为国学讲师,其后转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教授以及他的故乡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应邀到美国耶鲁大学讲学,获颁人文科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7年,钱穆夫妇从香港迁居台北,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协助之下定居外双溪。钱穆将居所取名“素书楼”,是为纪念母亲的照护之恩,他17岁那年患伤寒,病情危重,差一点就没命了,多亏母亲的细心护理,才使钱穆死里逃生。当年钱穆在无锡老家养病的房间叫“素书堂”,因此台北居所名为“素书楼”,纪念母亲的养护之恩和母子相伴的珍贵回忆。

素书楼是一座两层建筑,依据钱穆夫人胡美琦亲自绘制的图纸施工完成。外观朴实简洁,拾阶而行,枫树夹道,两旁素雅简洁。推门而入厅内,就是钱先生当年讲学的客厅。据说钱穆一生乡音不改,讲课从不

带课本,知识渊博,学问由浅入深,颇具生活乐趣,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二楼是钱穆先生的书房,书柜由地面而起直顶天花板,存放着他的一些手稿与著作。楼前长廊上的藤桌藤椅,是钱穆与夫人胡美琦在写作讲课之余日常说话聊天的地方。胡美琦曾说:“宾四(钱先生字)在家闲话,从不谈他的学问,他爱从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和他亲身接触的种种人事,来谈生人问题。”胡美琦非常珍惜和先生钱穆在长廊上的闲谈时光,出版了《楼廊闲话》一书,记录两个人的生活点滴。

钱穆名大有几点,一是学问大,他在一位乡村教师一路下来,成为中国现代为数不多的国学大师,被人称为“钱穆去后无大师”。著作75部,计1600万字,顽强自持,卓然成家。二是年龄大,得享96岁高龄,钱穆的祖父37岁辞世,其父41岁,长兄病亡不到40岁。家中“三世不寿”,极大地影响着钱穆的心理,他说:“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于是从中年开始健身,此力不辍,喜欢郊游,爬山,洗冷水浴。三是一生坚持己见,不为他人左右,学问之事,贵能孤往,迂腐得自成一家。他反对新文化运动,与胡适、傅斯年等新

文化运动健将认识相左。他认为中国思想界“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到了台湾之后,正值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虽有人推荐钱穆为研究院院士,却一直未得。倒不是胡适本人反对,而是有人怕胡适不悦,其实胡适包容心极强,常对他的学生说,与先秦诸子相关的学问,可以直接向钱穆学习,不必再请教自己。胡适病逝后,钱穆终得“院士”称号。最让钱穆出名的还是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那篇著名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提到了钱穆、傅斯年之流。因为那年钱穆、傅斯年一个去了香港,一个去了台湾。而其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移居台北之后,钱穆先后出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化大学)历史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等职。从离乡到逝世于台湾,钱穆心里一直惦记着故乡故人,他曾经几赴香港与来自大陆的亲人相聚,表达思乡之情。钱穆故去,他的骨灰被带回家乡,安葬在无锡的钱氏墓地,了却遗愿。

钱穆是出色的“三好生”:好出游,在北京教书时曾到济南大明湖、千佛山及曲阜三孔、泰山游山逛水。好杂耍,喜盆景,下围棋,听戏曲,善吹箫,生活之乐,样样精通,弟子称其为“很懂得生活之人”。好读书,有书便读,有书就买,北京时期他买了50000多册书,自嘲失去了工作就以卖书为生。

游山读书,用功尽在一心。这是钱穆先生对自己的评价,十分得当。素书楼下,发思人之情愫:一代国学大师,非钱穆莫属,有他,人文幸得绵延。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作者,出版作品多种)

关于《五牛图》的创作初衷,后世给了这样一种说法。韩滉与朋友闲聊,说到绘画,朋友说:“论画者都知道,驴、牛和马等,都是常见的牲畜,最难画出它们形貌。你怎么看?”韩滉说:“是啊,牛马都是人们熟悉的家畜,平日所常见,画家稍有不慎,或者偶有误笔,人们就能发现,所以一般画家都不涉及这类题材。”他话锋一转,“不过话说回来,也没什么难的。”这应该是后世对“画鬼魅易画犬马难”(《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犬马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且

【宣纸上的故事】

有牛不高兴

□李北山

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的附会,旨在说明韩滉画技之高超。这是从艺术本体出发,对艺术品创作初衷的探讨。在后世的流传中,赵孟頫和乾隆皇帝又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解读。

《五牛图》中有一头牛戴着笼头,它眼神冷漠,缓步跂行,苦苦思索,眼神中有难过,有恼怒,有无奈,很不高兴。赵孟頫和乾隆的笔墨官司就围绕着这头不高兴牛展开。

赵孟頫在任同知济南路总管时,两次题跋《五牛图》。第二次题跋曰:右唐韩晋公《五牛图》,神气磊落,希世名笔也。昔梁武帝欲用陶弘景。画二牛,一以金络首,一自放于水草之际,梁武帝叹其高致,不复强之,此图殆写其意云。子昂重题。

这次题跋,赵孟頫留下了“神气磊落,希世名笔”的评价,同时在韩滉跨越数百年的神会中,就《五牛图》的创作初衷提出了他的观点——他从中读到了陶弘景与梁武帝故事。

陶弘景是南朝齐、梁时期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隐居句曲山。梁武帝萧衍早年便与陶弘景认识,萧衍称帝他亦有贡献。萧衍称帝后想让其出山为官,辅佐朝政。先是东阳郡守沈约多次写信邀请,他不去;接着,梁武帝又亲自出面,许诺了很多条件,他也不为所动。皇帝问他:“山中有何,让你不出山?”他先写了一首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接着又画了一幅画:两头牛,一个自在地吃草,一个带着金笼头,被拿着鞭子的人牵着鼻子。梁武帝一见,便知其意,虽不强勉其为官,但书信不断,常以朝廷大事与他商讨,人称“山中宰相”。在韩滉所画《五牛图》中,独有一牛戴着笼头,而且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在赵孟頫看来,那是韩滉的自拟,身在朝廷,面临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繁冗政事,很是向往陶弘景的自由洒脱。

1753年,乾隆御笔题《五牛图》,题了一首诗:“一牛络首四牛闲,弘景高情想象间。祗说谁夸曲首,要因问喘识民艰。”这首诗就题在画心,所用字体是赵(赵孟頫)体行书,大概是向这位旷世的大家致敬。但他的诗却写得毫不客气。“一牛络首四牛闲”。有一种说法,韩滉以五牛代表自己的五兄弟,只有他自己还在朝为官,其余四位都赋闲了,这是韩滉自比。赵孟頫就以此来比喻韩滉和陶弘景一样的清高格调。乾隆对此很不以为然,略一点题,就向赵孟頫发难,“弘景高情想象间”,说这是你赵孟頫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那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呢?他接下来描述五牛神态,“祗说谁夸曲首”,说这样画的目的是,“是因问喘识民艰”。原来,汉宣帝时的丞相丙吉出行遇到有人斗殴,他过而问。然而,遇到路边牛在喘气,他却停下来,很关心地问赶牛的人,牛走了多远的路,这么喘是怎么回事?属下不解,说人都打死了你不管,却关心牛喘粗气,这是为什么?他解释说,路人斗殴是地方官该管的事,而牛在春天路行不远就喘成这样,说明季节不调,会影响农事,这是作为丞相应该关心的大事。这就是“丙吉问喘”的典故。乾隆的意思是说,韩滉的觉悟没那么低,他是像汉朝的宰相丙吉一样,画五牛图就是为了关心黎民疾苦。

从《五牛图》中,赵孟頫看到的是“思归”,乾隆看到的是“爱民”。

(本文作者为艺术学者)

【读史札记】

□牟钟鉴

在聪明与糊涂之间

板桥在人生目标、价值取向上既不糊涂,而且居仁由义,善恶分明。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他要糊涂一点,宁可自己受损吃亏,也要去帮助弱势群体。

清代“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所书“难得糊涂”的字幅广为流传。将其视为座右铭的人之中,有些人以为它的用意是宣扬圆滑自私,不分是非、明哲保身,其实大谬不然。“难得糊涂”是劝人忠厚积德,少一点个人盘算的机关,这是比一般聪明更高级的糊涂。当初孔子、孟子在推崇“中庸为至德”的同时,疾力批评“乡原”。中庸以刚健行仁为标尺,反对过与不及;“乡原”则是乱德的媚世者,宁与浊风恶俗同流合污。表面上两者都不走极端,有些相似,而实质完全相反,关键是在是否坚守仁德,故有善恶之别。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正是教人多做好事,践仁利他,自家利益不要太过计较,进取有度,必要时退一步,以使自己安心。

我的专业不在文学,更不是研究郑板桥的专家,只是喜欢郑氏的作品。近重读《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深为他的“与舍弟书十六通”所打动,引起一些新的感想。这些家书与他的“诗、书、画”三绝不同,不是为了送人和流传,纯属兄弟间有话要说,有事相托,故不工雕琢,随意写来,涉笔成趣,漫谈家事国事,又及历史文化,无一不是从生命深处潺潺流出,真情实意,感人至深,表现出一位忧国忧民的儒道互补的士人的博大胸襟,又质朴亲切,直白晓人,比之那些时文宏论,另有一番意蕴滋味,却似乎未能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

我还从中找到了“难得糊涂”的正解,是近来一大收获。他在一封家信里说:“愚兄为秀才时,检家中旧书箴,得前代家奴契券,即于灯下焚去,并不返诸其人。恐明与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怍。自我用人,从不书券,合则留,不合则去。何苦存此一纸,使吾后世子孙,借为口实,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为入处,即是为己处。若事事预留把柄,使入其网罗,无能逃脱,其穷愈速,其祸即来,其子孙即有不可问之事,不可测之忧。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直是算尽自家耳。”板桥以仁心积阴德,不仅不要求受惠者回报,而且不使其知晓施惠者为谁,以免对对方怀感激不安之情,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聊斋》里有一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个标准也许太高了,所以我改为:“有心为善,赏之何妨?无心为恶,不可再犯。”板桥思想里存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家族报应观念,其中包含着“爱人者,人恒爱之”的社会人生真理。若忠厚者处处吃亏,狡狠者时时得意,则社会必将变成虎狼世界,人类文明必不如此发展。社会生活尽管善与福不对应的现象颇多,它却更多地展示出这样的因果规律:太“聪明”的人,特别是那些工于谋划如何损人利己的人,常常是以害己告终,

如《红楼梦》所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是小聪明大糊涂。不是吗?美国当政者处心积虑地算计中东国家的利益,不惜用最精确的制光导弹乱炸乱杀那里无辜的百姓,何曾想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又哪里料到会把一股恐怖主义的祸水引到自家的土地上,从而发生“9·11”悲剧,并且至今终日惶惶不宁?社会上那些贪得无厌的赃官和非法团伙,到头来不是一个又一个落入法网,受到法律的严正制裁吗?有些企业用假冒伪劣产品砸了自己的牌子。有些学界人物用投机取巧的手段,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毁了自己的人格和前程。这些人都是在邪道上太聪明了,以至于变得愚不可及。在该聪明的地方糊涂,在该糊涂的地方聪明,是可悲的。

又有一封家书谈购置墓地作为自己身后安葬之所。墓地本有自主孤坟一座,其父曾因不忍割去而要购。板桥示其弟买下来,并“即留此孤坟,以为牛眠一伴,刻石示子孙,永永不废,岂非先君忠厚之义而又深之乎!”他并不在意墓地风水的好坏,而谓:“吾辈存心,须刻刻去浇存厚,虽有恶风水,必变为善地,此理断可信也。”板桥强烈同情农夫,谓:“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所

以为官者不能“贪求无厌”,而要体恤农夫。在他的诗词中多有表现民间疾苦的诉求。自己则以清廉自律,故仕途不顺,不得升迁。

可知板桥在人生目标、价值取向上既不糊涂,而且居仁由义,善恶分明。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他要糊涂一点,宁可自己受损吃亏,也要去帮助弱势群体。其实这是大聪明小糊涂。我们要在“难得糊涂”的背后,发现板桥的“难得聪明”,这种聪明属于大智慧,能够完善人格,兼善天下,见世俗之利则有不争之德,在有些人看来是愚笨可笑,故大智若愚。精神境界不同的人是很难有共同语言的。现在大家都想做聪明人,不愿意被称为糊涂人。但什么是真聪明,什么是真糊涂,并不容易取得共识,除了认识上的分歧,还有价值观的不同。人各有志,各有自己的活法。聪明人只要不聪明到害了自己,糊涂人只要不糊涂到触犯犯理,也就罢了。但善恶却是不同道的,如板桥家书所云:“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假若想做一有理想有道德的人,使自己的生生活充满光明、自在和安详,能够远离丑恶和烦恼,不妨在修习的过程中读一读《郑板桥集》,人们会从中得到许多人生的启迪。

(本文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